



大学经典

古书疑义举例

[清]俞樾著

马叙伦校录

傅杰导读



上架建议：文化专题
ISBN 978-7-5325-4799-9

A standard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9787532547999.

9 787532 547999 >
定价：16.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古书疑义举例

[清] 俞樾 著

马叙伦 校录 傅杰 导读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书疑义举例/(清)俞樾著；马叙伦校录；傅杰导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9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大学经典)

ISBN 978-7-5325-4799-9

I. 古… II. ①俞…②马…③傅… III. 汉语—古代—研究 IV. H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3524 号

责任编辑 田松青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古书疑义举例

[清]俞樾 著 马叙伦 校录 傅杰 导读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mm 1/16

印 张 9.75

插 页 4

字 数 170 000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4799-9/H · 50

定 价 16.00 元

古书疑义举例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含“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

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势而为，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

“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7年1月

古书疑义举例

导 读

傅 杰

—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是晚清著名的学者。道光三十年（1850）会试时，因复试中有“花落春仍在”的诗句为曾国藩所激赏，拔为进士第一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二年（1852）散馆授编修，五年（1855）简派为河南学政，两年后因御史曹登庸弹劾他院试出题“割裂经义”而被罢免。晚年虽然复官，但自此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殚心著述，

“每竟一岁，皆有写定之书刊布于世”（缪荃孙《俞先生行状》），所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曲园杂纂》、《俞楼杂纂》、《茶香室经说》、《茶香室丛钞》等多种，汇为《春在堂全书》。又先后授学于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德清清溪、归安龙湖诸书院，而主持杭州诂经精舍更长达三十余年，从其问学者有戴望、黄以周、朱一新、缪荃孙、陈汉章、章太炎等。少所许可的晚清名士李慈铭对俞氏的著作颇有批评，但仍总体肯定其“多识古义，持论有本，证引疏通，时有创获，同时学者，未能或之先也”（《越缦堂读书记》）。以至他八十六岁寂寂以终时，跟他学术趋向不同、对他的学术成就也颇有保留的王国维还愤然为之打抱不平：

德清俞氏之歿几半年矣。俞氏之于学问固非有所心得，然其为学之敏与著书之勤，至耄而不衰，固今日学者之好模范也。然于其死也，社会上无铺张之者，亦无致哀悼之词者，计其价值乃不如以脑病蹈海之留学生。吾国人对学问之兴味如何，亦可于此观之矣。（《教育小言》）

王氏所指的是社会的舆论——那只是一时的，而不是历史的评价——那才是永久的。寂寂以终的俞氏身后并不寂寞，他的著作被不断重印，见解被反复称引。杭州西泠桥畔的诂经精舍旧址，也已在二十世纪末被改建成为俞曲园纪念馆。

二

在学术上，俞氏私淑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群经平议》、《诸子平议》从总体格局到具体形式都是以《经义述闻》、《读书杂志》为范本的。《经义述闻》除了群经校释札记，还有《通说》，对训诂与校勘中的专门问题作了申论；《读书杂志》除群书校释外，在《读淮南子书后》中特别揭出古书致误之由六十二条。俞氏则在二《平议》外另撰《古书疑义举例》^[1]，既融会自己《平议》中的心得，又广采前人尤其是顾炎武、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刘台拱诸清代学者的成果，归纳古书中的特殊语言现象以及文字窜衍脱讹的类别等，共得八十八例，成为他本人众多著述中最引人瞩目的杰作。

俞氏在自序中谦称，本书目的在于“使童蒙之子，习知其例，有所据依，亦或读书之一助乎？若夫大雅君子，固无取乎此”。其书既出，“童蒙之子”固可循此以窥阅读古书尤其是先秦两汉典籍的门径，而“大雅君子”亦赞不绝口。章太炎在《检论·清儒》篇中说：“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

抵牾者，各从条例，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而在《俞先生传》中更以俞著与王氏父子著作相较：

治群经不如《述闻》谛，诸子乃与《杂志》抗衡。及为《古书疑义举例》，驯察鰥理，疏繆比昔，牙角才见，绚为科条，五寸之矩，极巧以展，尽天下之方，视《经传释词》益恢廓矣！

刘师培则著《古书疑义举例补》，在序中称：

幼读德清俞氏书，至《古书疑义举例》，叹为绝作，以为载籍之中，奥言隐词，解者分歧，惟约举其例，以治群书，庶疑文冰释，盖发古今未有之奇也。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表彰说：

荫甫发见出许多古人说话行文用字之例（卷一至卷四），又发见出许多后人因误读古书而妄改或传抄讹舛以致失真之例（卷五至卷七）。上半部我们可以叫他做“古代文法书”，下半部可以叫他做“校勘秘诀”。

他明确要求，对于俞著“凡有志读秦汉以前书的人，总应该一流览的”。

确实，不谙俞著，“童蒙之子”固无论矣，虽“大雅君子”也难免在古书的解读与研究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出现大大小小的失误。直接的例子如柳存仁在八十年代还指出，俞氏已经订正了的古书误读现象，至今仍有我们在重蹈覆辙者：

前人的业绩可佩服的地方依旧很多，像《论语·子罕》末章引逸诗“唐棣之华”四句，下面孔子的话，不论何晏或朱熹都

是这样断句的：“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俞曲园的《古书疑义举例》卷七有“误读‘夫’字例”，指出这里应该念：“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也夫”连文在古书里是很常见的，《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就是一个现成的例。但是如果“夫”字下面还有句子，“夫”字连到别的句子前面去了，像《孟子·离娄上》“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现在大家就念成“夫国君好仁”了。这样的例，俞曲园还举了《庄子·徐无鬼》、《吕氏春秋·开春篇》，都并不需要改字，可是把句读弄清楚了，读起来就教人听了怡然理顺。（《和风堂新文集·关于朗诵〈论语〉》）

间接的例子如杨树达在三十年代批评胡适误解古文文法：

海通以来，学者艳羨夫通则之可贵也，务欲强为之，偶见《论语》、《左传》、《庄子》诸书有“吾”“我”并用，数事皆“吾”在主位，“我”在宾位，遂谓吾国文字亦有如欧洲文法分位者焉，其与彼说相违之例，巧以例外屏之，其他代字绝无位可言者，若未见也。又如名代动静诸字有同义变文用之者，益不之顾矣。不悟古人行文尤忌复叠，故务避而不用，此修辞之事，非文法之事也。夫中国文字，名字无位别，对称之“尔”、“汝”，他称之“彼”、“夫”，皆无位别，惟独“吾”、“我”有之，世岂有此尪跛不全之文法乎？（《积微居小学述林·温故知新说》）

所谓“古人行文尤忌复叠，故务避而不用”，正类于俞著开卷揭示的第一条“上下文异字同义例”。明乎其例，我们就很容易认同杨说。杨氏批评胡氏“不温故而欲知新”，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事出有因的。

俞氏治学的功力虽不足与王氏父子比肩，但亦时有突过前贤之处。这不仅表现在他在两《平议》中涉及了王氏父子尚未注

意的问题——尽管有些其实是本不成问题的问题，还表现在对王氏父子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所谓拾遗补苴，钩沉索隐。例如《淮南子·人间训》：“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接叙叔敖“病疽将死”，王念孙《读书杂志》云：

此事又见《列子·说符篇》、《吕氏春秋·异宝篇》，皆不言孙叔敖病疽死。“疽”当作“且”。《史记·滑稽传》“孙叔敖病且死，属其子曰”，《贾子·胎教篇》“史鮦病且死，谓其子曰”，文义并与此同。《列子》、《吕氏春秋》作“孙叔敖疾将死”，将亦且也。今作“疽将死”者，“且”字因与“病”字相连而误为“疽”，后人以下文“谓其子曰”云云，乃未死以前之事，故于“死”上加“将”字，而不知“疽”为“且”之误也。

俞氏《诸子平议》则云：

诸书无言孙叔敖以病疽死者，“疽”乃“广且”二字之误，“病”“将”二字皆衍文也。《说文》广部：“广，痼也。人有疾病，象倚著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广”。其从矢之“疾”，盖疾速字，而非疾病字也。后人假“疾”为“广”，“疾”行而“广”废矣。“广且死”即“疾且死”也。其事亦见《列子·说符篇》、《吕氏春秋·异宝篇》，并作“疾将死”，将犹且也。彼作“疾”，此作“广”，古今字耳。因“广且”二字误合为“疽”字，后人乃于上加“病”字，下加“将”字，失之矣。

二者相较，俞氏不仅能知其然，更能追根溯源，力求周到圆满地解释其所以然。他自己也应该是因此而自得的，在稍事修改后，他将该条作为“二字误为一字”之例摄入了本书。后来陈垣著《校勘学释例》，还承其说而补充了《元典章》中类似的例子。

三

《古书疑义举例》早已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不朽名著，除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外，近百年间出现的续作还有杨树达的《古书疑义举例续补》（杨氏的《中国修辞学》也是对俞著系统的扩充）、姚维锐的《古书疑义举例增补》、裴学海的《古书疑义举例四补》、徐仁甫的《广古书疑义举例》等。而专就俞著本身作校正者，则有马叙伦的《古书疑义举例校录》。

马叙伦（1884—1970）字夷初，号石翁、寒香、石室老人，浙江杭县人，是现代著名的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说文解字研究法》、《老子校诂》、《庄子义证》等，与俞氏相近的特点是博极群书，小学功深，勤于著述，勇于裁断。他高度评价俞著“发蒙百代，梯梁来学”，以“讽籀所及”而“小有怀陈”，因成《校录》，或作补充，或为商兑，个别地方不免凿求过深，未必皆当，然读书得间的精到之论亦往往而有，终不失为我们读俞著乃至读一般古籍的必要参考。如“上下两句互误例”，俞氏谓《老子》第十章“爱民治国，能无知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二句，上句“无知”当作“无为”，下句“无为”当作“无知”，而王弼本误倒之。马氏不以为然：

“能无知乎”，傅奕本作“能无以知乎”，范应元古本同。范谓王弼同古本。诒弱注曰：“治国无以智，犹弃智也，能无以智乎？则民不辟而国治之也。”是王与傅同。今本经文，由后人妄改，幸注文尚可證也。成玄英《道德经义疏》曰：“知，分別智也。”又引下文“以智治国，国之贼”为说，是成本亦作“能无以知乎”。宋刊河上本作“能无知”，今本作“能无为”，盖后人依

石刻改，不可据。

按此意晚清易顺鼎《读老札记》已发之，马氏增引成疏，更坐实了这一点。马王堆所出帛书《老子》乙本作“能毋以知乎”。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谓：“事实上，王弼本之‘无知’意义已不同于帛书本之‘毋以知’。据文义，作‘毋以知’为上。‘知’应读作‘智’。作‘智’正合第六十五章之义：‘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我们既读《校录》，可知王弼本出后人妄改，而刘氏的释义只是王注成疏的重复与申说，帛书本与王弼本意义实无不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援前人与己说以申俞正俞之外，马氏还能以俞氏晚年著作与《举例》互证，以见其立说的变化，如《古人行文不避繁复例》下，引俞说“《墨子·尚贤》、《尚用》、《兼爱》，各分上、中、下三篇，而文字相同者居半，此亦古人不嫌繁复之证”，而后告诉我们：

《俞楼杂纂》卷三十四，论《墨子》三篇如一篇曰：“读《韩非子·显学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然后知今之《墨子》书有三篇如一篇者，乃合三家为一。此三家传述文字不同，故每篇各分上、中、下三篇，以别异之也。”是先生后已不以此数篇为古人行文不避繁复之例矣。

这样的补充说明，无论是对读者深入理解古书中的疑义，还是对读者全面把握俞氏学术观念，都是不无裨益的。

《校录》自然不是马氏最重要的著作，但也颇受士林推崇^[2]，学者或引其说以纠驳俞著（如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或引其说以校释古籍（如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

而自 1918 年成书以来，也每每与俞著一并刊行，如二十年代长沙鼎文书社的《古书疑义举例丛刊》、三十年代上海世界书局的《古书字义用法丛刊》、五十年代北京中华书局的《古书疑义举例五种》皆然。此次重排，特意将《校录》放在其所对应的《古书疑义举例》原文旁边，以便读者阅读和检索。

四

前人的学术规范观念或不甚严格，以我们前举《诸子平议》订正《淮南子·人间训》孙叔敖“病疽将死”的例子而言，俞氏既未交代王念孙已有的讨论，也未标明关于“广”“疾”二字关系的考订参用了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的意见（到撰本书时才直接引用朱著）。但《古书疑义举例》中的多处用例都标明了来历；而条例的归纳总结，更是俞氏超迈群伦的可贵贡献。不料近人刘声木在 1929 年梓行《苌楚斋随笔 续笔 三笔 四笔 五笔》，其《四笔》中有“江藩古书疑义”条，据坊间流布署名江藩的《经解入门》中之《古书疑例》与俞著大同小异，遂疑俞氏剽窃。他在书中抄示了《经解入门》该条的全文，揭发俞著“体例全自此出”，“实以本篇为蓝本，而书中无一语道及，迹近攘善”。按刘氏为清季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著录其书，谓“刘氏少席丰厚，颇勤涉览，惜其学无本原，仅披枝叶。即此五十卷之书，多从群籍中撮录而成，益之以旧家见闻及晚清遗事，可资文士谈助，未足语乎撰述之林也。《随笔》、《续笔》差胜，自《三笔》以下，则多拼凑之辞。其意盖在贪卷帙之丰盈，未及求内容之精实，宜其肤滥乃尔”。而“江藩古书疑义”条，正是一个“未及求内容之精实”的恶例。

1998 年中华书局将刘著收入《历代史料笔记丛刊》重印，新